

新文化运动下的新旧学派缩影——鲁迅与王国维

陸安琪*

■ 国文摘要

本文将从新文化运动时期旧学派中的王国维和新学派的鲁迅着手，分析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社会的影响。

第一部分简述中国清王朝末年的社会环境，朝代的更替在政治上对中国势力划分进行洗牌，知识分子渴求从思想上拯救国家；第二部分以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和过程为主，旗帜分明的新旧学派就当下以救国为己任，新学派主张抨击中国传统封建礼教，推动现代思想文化的传播，改革中国文学；旧学派拥护孔孟之道，不欲从西方的路寻求中国该走的道路，坚持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第三部分结合鲁迅和王国维的人生经历与二者的代表作，剖析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起落，包括二人之间的交集和对立，代表的两个群体之间的交锋和相互影响。

最后总结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中，民主主义者和守旧主义者对其始末的看法与反思。

【关键词】 晚清 新学派 鲁迅 旧学派 王国维

* 濟州國立大學 中語中文學科 博士課程

I. 引言

中国清王朝末年，社会环境动荡不堪，封建王朝覆灭已无力回天，在这种背景下，王国维的内心备受煎熬，一方面他内心遵循封建社会制度，抵制新文化思潮，但另一方面他也曾研究过西方哲学思想，接受过现代教育，王国维没法在这样的文化思潮中明哲保身，最终在封建王朝覆灭的双重打击下自沉身亡。中国近代文学史中，也有一位灵魂痛苦不下王国维的学者，那就是鲁迅。鲁迅不比王国维对中国古典文化了解的少，他主动在日本留学期间中断学业，弃医从文，一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中，然而过于清醒的鲁迅面对麻木的中国社会，只能坚定的与志趣相投的战友坚持推广新学。

纵向对比来看，两位学者的人生轨迹非常相似，二人甚至是同乡，都出生于浙江，从小接受封建教育，此后对科举毫无兴趣，同样赴日本留学，王国维学的是物理，鲁迅学的是医学，两人都中途结束学业回国，这是一个相同点，同时也是二人未来选择道路的分岔点，后文会详细分析；在二者投身文坛之后，也都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王国维重戏曲经史，鲁迅重小说；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中，这两位重量级的文学大家却站在了相对的立场，最后走向各自的结局。

与当时针锋相对各成一体的学派不同，从历史的角度看新旧学派，只是当时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一个相对概念。在中国晚清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预示中国封建社会的崩塌，另一方面展示了现代文学的兴起。

本文尝试从新文化运动中新旧学派双方阵营的代表人物来分析当时独特的文学环境，以及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文人学者心目中是如何被理解及被批判的。

II. 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为1915年至1923年，而中国清王朝覆灭于1912年，新文化运动产生于东西方思想文化碰撞最为激烈的时刻，西学东渐，激进的知识分子相信新事物一定能够战胜旧事物，在当时划分新旧学派的标准即在于是否主张务实。

新文化运动最直接的发起原因在于1913年袁世凯复辟，当时思想界活跃的知识分子大力引进西方思潮，主张反孔反礼教等。新学派首先意识到就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而言，传统文化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但早期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探索到一个适合中国的生存方式，他们全盘否认传统，主张全部抛弃。1916年《青年杂志》正式更名为《新青年》，这象征新学派知识分子正式以全新的身份和视角寻求适合中国的文化模式。

诚然这个时期的知识群体走的还是以西方文化重塑中国的路子，企图直接硬搬西方现有的方法拯救危难中的中国，原因是当时恢复帝制借用的就是孔教，面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压制，《新青年》群体急于寻求反击，以尤其重视平等人权的西洋法制予以制衡。他们还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政治方面不尽如人意，根本问题出在没有稳健的文化基础，这当然可以解读为新派为了宣扬自己的文化而鼓吹的言论，但不能否认的是新派确实在进行文学的革命，且在他们的认知里，革即是革新，要把旧的去掉，以全新的文学来获取社会的革新。

《新青年》群体最初是紧随欧洲革命的脚步，其中倾向于法兰西革命，在各种论证中，不论是文化、社会、革命、政治等等都离不开法兰西革命，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欧洲社会原本大多建立在君主制、贵族统治，而后人民反抗推翻了君主制，乍一看这与知识分子追求的结果不谋而合。他们所希望的就是人权、自由，中国之所以为国家，而非一个集中的专权统治。

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少部分人拥有的这种思想，并不足以构成能够真的推翻中国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群体，加上儒家思想依旧牢牢的束缚中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初期的诉求注定是没有结果。

在认识到如果不先打破思想上的禁锢，就没有进行下一步的可能这个事实后，1917年新派进一步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宣扬男女平等。在逐渐明确整体社会矛盾需求后，虽然文化议题仍然占《新青年》刊发主流，但陈独秀已经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里提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¹⁾这是这个群体开始为文化转变为政治、文学转变为哲学的一个信号，在此之后《新青年》越来越倡导政治化取向。

其实这个时候《新青年》已经与政治问题相互关联而不自知，或者说不是非常明显，此时借用政治为文化抗争，他们把政治看作是一种文化的表达方式。

1) 陈独秀，1916，“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1(6)。

例如胡适发表的文章基本都是同一个主题,即挽救中国的命运,关键在于改变人心,不论是道德、科学还是文学、语言,包括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伦理结构和教育制度.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在中国新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间引起风潮,也确实在这之后,中国共产运动逐渐发展.前面提到过早期『新青年』群体就已经有意无意的搭建了政治行为的框架,马克思主义顺理成章的成为政治革命的核心思想.而后期『新青年』群体开始转向政治化阶段,最为明显的就是引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使新文化运动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圈子内部,转而面向群众.大部分转变为政治领域的时间是在1922年左右,这个时候新旧学派之间的斗争已经不明显,升级为更加激烈的政治斗争舞台.

这个阶段的陈独秀已经把解决新旧中国社会矛盾的关键转向了政治,他提出:“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²⁾知识群体已经明确救治中国的方法正在于修正新的政治制度.

在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三年间,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完全成为引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指导,『新青年』群体也明确指出中国的政治踏上了新的出发点.当时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件中提到:

“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的政权,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³⁾

所以就政治领域而言,中国想要走上共和很艰难,知识分子既无法实现以共和为核心的民主,也无法代表人民反映意志.在这种境况下,『新青年』群体以唯物的历史观看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此一来,在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必然会战胜资产阶级,只要能够实现在无产阶级群体中种下阶级斗争的思想种子,那么知识群体就不是独自在战斗.对于他们而言,革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最终追求的是思想上的革新.

2) 陈独秀, 1916, “我之爱国主义.” 『新青年』, 2(2).

3) 载张允侯、王云开, 1979, “蔡林彬的欣(节录)——社会主义讨论、主张无产阶级纲领” 『五四时期的社团』 (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8-29.

在这些思想革命的历程中，旧学派扮演的角色始终处在非常尴尬的地位。新文化运动开始时，清王朝已经覆灭，作为清遗民的群体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强有力的后盾及理论依据。当时的旧学主要指以科举八股为基础而形成的文化体系，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封建王朝不复存在，但是知识体系已然形成，即便社会环境已经发生改变，形成的原因依旧不变。

那么当时还反对以宋学、汉学等词章一类与“务实”背道而驰的“虚文”，即与社会现实而言没有实际作用。例如宋学擅义理，所研究的对象；汉学主要涉及的是古文、经卷。与西学相比，这些知识虽然有研究的价值，但不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因此旧学退出学术文化主流，完成当时文化形态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更替。

III. 鲁迅与王国维

鲁迅，原名周树人，在南京求学后到日本留学，再从学医转到从事文学活动，这是他的思想和价值观发生改变的时期，也是形成独立思想的过渡时期。在经历辛亥革命、封建王朝覆灭、新文化运动兴起，鲁迅代表的是自由派知识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其他代表人物还有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这一群知识分子主要冲击的对象就是文学及文字语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中国传统文学不遗余力、不加区分的打击是新派尤为激进的一点。但就鲁迅所扮演的角色而言，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更多的是用作品映射社会环境。他心系传统文化，本身又是近现代知识分子，两者结合塑造了鲁迅复杂深刻的文学个性。

鲁迅一生坚持国民性批判，特别是对那些为骄妄的当权者和军阀藻饰的正人君子，以及后来变成军阀的帮闲文人们，极尽嘲讽和揭露。在这些正人君子和文人堂皇的言行文字背后，就是各种为自我和为有权者无耻行径进行张目的“自欺欺人”的阴鹭和文饰。文人与官僚的自私和卑鄙、无耻和龌龊往往是同流合污的。

对于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鲁迅是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这种自学推进了他的文化批评和文学创作，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小说这方面开创独特性的原因所在。而鲁迅又常常带着一种奇异的自我反思精神，让他的作品时常保持独特

的视角.即便是处在文化政治漩涡的中心, 鲁迅也从未停下过对传统文化的研究.

鲁迅在分析周王室衰落的时候就指出政治原因会加速旧文学的消亡:“周室寝衰, 风人辍采; 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⁴⁾鲁迅本身就认为文学的形式不断的变化发展, “便是文章, 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⁵⁾他同时熟知中国古典文化, 又学习了西方现代思想方法, 在研究文学史上有突破性的意义.而且鲁迅认识到历史的前进并非是直线, 新旧的交替是历史进程的正常现象, 由此推出文化也是如此, 在进化的路上必然会出现反复, 总体的方向都是前进的:“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 这便是壮, 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 这便是死; 各各如此走去, 便是进化的路.”⁶⁾在鲁迅的说法中可以看出, 对于新的出现, 是值得欢喜的事情, 旧的消亡, 也是不可避免的.

从晚清到“五四”运动时期, 中国文坛出现了大批眼光与思想同样深邃犀利的学者, 鲁迅在当时并没多么显眼.鲁迅在以西方人文思想为主的现代知识分子中, 不断的进行精神和思想的推进, 以文学家出色又独特的神经, 敏感的了解到由于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民众必然感到焦虑, 并且在这种焦虑中探寻走出绝望的道路.所以鲁迅在早期文化批判的思考中预见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可能导致人文精神的衰亡, 鲁迅的超越现代文化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从国民性改造的文艺启蒙思想入手, 从文学的审美理想发掘人性的麻木和黑暗, 提出人之为人的人文理想, 即建立个性自由发展的“人”国理想.但是现实的黑暗和人性的虚妄, 又是鲁迅面对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所面临的真实状况, 这就有了绝望与希望并存的思想与情感悖反的精神反抗.“鲁迅的文学史著述, 其优胜处在于史料功底扎实、艺术感觉敏锐, 另外就是这对‘世态’与‘人心’的深入理解以及借助这种理解来诊释文学潮流演进的叙述策略.”⁷⁾

鲁迅作为小说家的表现在于其近代文人生活方式的追求, 自我边缘身份的文化定位更直接的表现是其一生的阅读和研究主旨归于小说, 审美情趣也完全归

4) 鲁迅, 1981, 『汉文学史纲要·老庄』 『鲁迅全集』 第九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82.

5) 鲁迅, 1981, 『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 『鲁迅全集』 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4.

6) 鲁迅, 1981, 『热风·随感(四十九)』 『鲁迅全集』 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339.

7) 王瑶主编, 1996,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陈平原P80~114)』, 北京大学出版社, 108.

于此途.这种文化选择的科学知识和文化情趣发展的外在要求与条件的促成,周海波在其长文《文化传播视野中的鲁迅文学创作》(《鲁迅研究月刊》8)2003年第一期里,从不同的路径上做了考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鲁迅自觉的小说杂家的文化选择.最后,我们在高度赞扬鲁迅文学家深厚的启蒙思想的同时,不得不说鲁迅真正影响“五四”现代文学的主要方面还是他的小说创作和散文杂文写作,尤其是短篇小说,成为世纪中国文学最为丰赡的精神及艺术资源.

从经典作家的确立意义来说,鲁迅小说的诗性意义在于揭示了中国人生存的真实处境.从思想意义来说,人文学者的诗性情怀是艺术生命内在最为根本的东西,所以鲁迅深刻的文化批判构筑了鲁迅作品深厚的思想底蕴,折射出他文学创作独特的艺术力量.我们在批评鲁迅的时候可以从小说家的鲁迅提升他伟大的文学家的地位,可以深入阅读、体验感悟其贯注作品内里诗性的蕴含.从这样的路径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文学家鲁迅的语言修养和艺术张力,以及涵养高超的艺术审美的创作主体的诗人情怀.但对于一位历史伟大人物,我们还需回到最为真实和具体的言说层面来梳理和批评.因为这包含了更为深层的文化因素和现实状况,纯粹形而上的思想观念在现代中国不无内在无法摆脱的传统制约很难生根,能在中国赢得合法存在和广泛影响的思想必须像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以及他所喜欢的编辑著译活动中的渗透与存在.这从思想文化的发展和转变的意义,应该说还借助于晚清的开放和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力量.现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的散文化特性,使我们关注小说这主流形式,恰恰鲁迅也从不同方面深入触及了小说这一文体.

王国维是理性与感性两方面都具有天赋的人,感性上他喜欢文学,理性上他又喜欢哲学,当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掺杂上一个天才的忧郁和悲观之后,便组合成独一无二的王国维.

和王国维相识将近30年的殷南提到:“他平生的交游很少,而且沉默寡言,见了不甚相熟的朋友是不愿意多说话的,所以有许多的人都以为他是个孤僻冷酷的人.但是其实不然,他对于熟人很爱谈天,不但是谈学问,尤其爱谈国内外的时事.他对于质疑问难的人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偶尔遇到辩难的时候,他也不坚持他的主观的见解,有时也可以抛弃他的主张.真不失真正学者的态

8)《鲁迅研究月刊》创刊于1980年,月刊,是由国家文物局主管、北京鲁迅博物馆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

度.”⁹⁾

在文学上,王国维不仅进行创作,同时进行文化创作的反省.他在晚年对自己年少时花费十年时间研究西方哲学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但也正是因为王国维在西方哲学上颇有见地,他才能有底气说西方哲学的思考不过和中国千年前先贤的见解大略相同.

从中国文学发展和寻绎鲁迅的思想文化个性来说,鲁迅是真正的小说家,或者说是现代文学在近代萌芽新的文学思想以来,真正相信文学纯粹性的小说作家,而且是以相当的勇气选择了这样的学术理路和人生追求.可以说,纵观他的一生,鲁迅始终围绕心目中的文学写作这个核心在安排和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许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¹⁰⁾从这段文字完全可以看出,鲁迅对于自己的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是充分的自觉和选择.鲁迅的文艺启蒙思想是非常坚定的,而且贯注了他历史文化批判的现代精神,梦想着“摩罗诗力”的反抗权威和专制,“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达到改造国民性和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伟大理想.

王国维回国是因为养病,并非自愿,而鲁迅是深受国人麻木不堪的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对王国维清朝“遗老”的身份,相比于自愿选择,似乎更像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站队.因为王国维在各种运动中的身影并不频繁,而且新学派的学者们同样非常欣赏王国维的文学才干和著作.王国维年轻时受叔本华、尼采的影响,性格中带着浪漫主义色彩的,而晚年的王国维一直把自己局限在旧文学的研究中,虽说是从哲学转向经史无可厚非,但是真的能完全摆脱年少的影响吗?

对叔本华哲学中关于人生、欲望、苦痛有深刻思考感悟后,哲学在王国维眼里渐渐变成“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¹¹⁾的东西,于是他的思想最终还

9) 殷南,1927,<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专号』,1(2).

10) 周遐寿,1957,『鲁迅的故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6

11) 王国维,1987,『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44.

是转向忠于传统文学色彩。王国维早年的哲学观深深影响了他的诗词评介和戏曲研究，对康德、叔本华等的研读不仅影响了自身学术思考的广度和深度，也影响了王氏的治学方法。王国维以西方辩证思维和乾嘉学派实证考据相结合的方法作了大量的史料搜集、梳理、考证工作，王国维的戏曲美学就是建立在此详实的资料汇编之上的。

“故人所作戏曲何虑万本，而传世者寥寥”，可见有很多珍贵的戏曲材料业已散佚，不能被后人熟知，这对整个中国文学史来说是极大的遗憾，王国维意识到正是因为戏曲的系统研究近乎空白，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魅力已被很多人忽略，戏曲才被冠以“最不振”之名号，感于此，王国维遂将振兴戏曲之“志”放在了戏曲研究之上，开前人未有之境。在著《词录》的过程中王国维结识了很多戏曲藏友，他们为王国维搜集、考证戏曲史料提供了很大帮助，“其中有同在学部任职、后为北洋政府教育部长的藏书家傅增湘（沅叔），有时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以‘艺风堂’名其藏书处的缪荃孙，还有时任刑部主事、以起草《大清刑律》著称却热心收辑戏曲的董康（授经），以及以‘暖红空’之名辑印词曲的藏书家刘世珩（聚卿）等”¹²⁾。王国维除了时常与他们交流学问、互通藏书之外，还喜爱去各个民间书坊搜罗典籍，苦心翻阅、校对、作注并亲自抄录。王国维在戏曲研究上的立“志”之坚和用“力”之勤终于铸成《宋元戏曲史》这一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¹³⁾的精湛之作。

从王国维的哲学及人生价值观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十分重视内在心理和精神诉求的学者，无论是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还是对诗词歌赋的赏析品评，王国维始终坚持以“纯粹”的“赤子之心”来对待，他的“纯文学”观诱使其在评介戏曲之时免不了带有有色眼镜。“纯粹”文学对作品的内容、剧作家的品性等有着很传统的要求，重雅避俗、尊名士轻小人。故而在刚接触戏曲时，王国维无甚好感，因为首先从内容上看，戏曲描写的多是贴近社会现实生活的事情，或是家长里短的琐碎之事，或是风花雪月的恣情之言；其次从情感上看，戏曲主张直接道出内心情感，或是直言讽刺封建社会的残暴黑暗，或是歌颂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一部戏所要表达的主旨一贯鲜明，然而这些与“纯文学”讲究的无功利之表达、偏爱“古雅”与“天才”似有出入。早期在《文学小言》（1904）《静安文集》续编自序（1907）中王国维不止一次地表露对古典戏曲的失望，认为

12) 陈鸿祥，2004《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346-347。

13) 王国维著，谢维扬等编，2009，《王国维全集》第2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13。

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¹⁴⁾，而在『宋元戏曲史』（1913）中却一改前论，对元杂剧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其可与西方悲剧相媲美。从王国维对关汉卿的评价中可以明晰地看到这一转变：

“元初名公喜作小令套数，……士大夫之作杂剧者，唯白兰谷朴耳。此外杂剧大家，如关、王、马、郑等皆名位不著，在士人与倡优之间，故其文字诚有独绝千古者，然学问之舛陋与胸襟之卑鄙，亦独绝千古。戏曲之所以不得与于文学之末者，未始不由于此。”¹⁵⁾

台湾学者陈以爱在论文『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回应』一文中曾经详细考察了一九一年前后北大学人对王国维的关注，陈以爱尤其指出，鲁迅对于王国维的关注早在一九一五年便开始了，他从友人处得到了罗振玉、王国维合作的『流沙坠简』，鲁迅对其表达了极大的赞赏，甚至邀请自己的朋友来往处一同观看：“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¹⁶⁾鲁迅认为新文学和旧文学本就没有准确的分界，如前文所说的只是一个相比较而言的概念，不论是哪边的作品，都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存在。因此，鲁迅是认为新文学也应该吸取旧文学中有价值的部分，这与新文化运动初期一棒子否定所有传统文化有本质的区别。“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¹⁷⁾鲁迅不否认新文学产生时就位于旧文学的对立面，但他同样强调旧文学自有值得的部分，应该加以利用。

郭沫若曾将鲁迅和王国维放在一起做比较，说：“两位先生都富于理性，养成了科学的头脑，这很容易得到公认。但他们的生活也不偏枯，他们是厚于感情，而特别是笃于友谊的。”¹⁸⁾陈平原在谈到他俩时说：“相对于同时代的大学

14) 王国维著，谢维扬等编，2009，『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22.

15) 王国维著，谢维扬等编，2009，『王国维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89.

16) 鲁迅，2006，『热风·不懂的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93.

17) 鲁迅，1981，『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355.

问家如王国维等，鲁迅对于学术的‘忠诚’显然不够。”

1. 『中国小说史略』与『宋元戏曲史』

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传统文化以诗文为正统，戏曲小说皆为末流，有关文献少之又少。『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中不甚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所作，『宋元戏曲史』针对的则是在王国维之前，同样不算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戏曲。两位的勇气即可并肩，所著的著作在文坛的地位亦可谓熠熠生光。

宋以来中国传统的白话小说和各种民间戏曲很发达，形成了丰沛的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西方的文艺复兴也好，中国的民间文艺的发达也好，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群体生活的活跃，与人们日常消遣紧密联系的小说戏曲形成巨大的文化潮流，并不断与社会上层特权文化形成对抗和互动。作为主流的上层文人，在这种互动的活跃过程中，不得不考察和关照所处时代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及其存在形态；反过来，大众文艺和不断上升的审美要求，也吸引一些优秀的作家文人来搜集整理、进而促进各种通俗文艺的迅速发展，形成专门的创作甚至递延擅变成一个时代新的艺术潮流。唐宋传奇、宋元戏曲和明清小说，虽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及时进行积极的整理研究，但均为其历史时期的代表性文学。这在清末民初的文化转型和学术拓展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批评研究，所以唐宋以来的、特别是明清小说戏曲的发掘整理成为中国“文艺复兴”——清末民初的文艺与学术研究的再发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新旧文化传承的意义上，高度评价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原因所在。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有着同步的应合和相互的影响，但又并非完全一致的。

『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于1923年，然而并非是短时间内完成的，早在辛亥革命前，鲁迅就已经在着手于收集有关材料，包括对古代小说的辨伪、辑佚和书目的整理。1920年鲁迅在北京大学等地教课时，所用的讲义就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前身。

18) 李宗英、张梦阳编，1982，《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93。

从更为深入的社会文化的反映来看,小说的发展史不仅是文学史的一个有机部分,也是真正能够全面反映社会风貌和人们的感情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小说和其他文艺形式一样,是反映人类生活最为感性的内心隐忧、情感渴求和生活向往的.鲁迅的思想一直有着抗争和不屈的精神,在他的作品里也尤其明显,对于文学批评,他的锋芒始终对准人的心灵和灵魂,在单纯的美学基础上又往更深层次进行探讨,他编撰『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想以一种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关照中国传统文学.

这恰恰体现了鲁迅文化价值取向的形成过程,他的精神层面并不是突然爆发,同样是在一个长久的文化氛围中,经过社会环境变化后,逐渐积累的一种价值取向.鲁迅的精神是积极的、无畏的,所以他的作品也呈现出与众不同

鲁迅认为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¹⁹⁾,小说则发展于神话,同样经过演进,在逐渐愈加分明的转向反映社会现实的艺术形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说,吴趼人他们的作品,过多记录了“惊听”的“话柄”²⁰⁾,但正是这种不假修饰的小说叙事给我们留下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原貌.近代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除了列强的强权要求和武力威胁以外,与中国模糊的国家意识和传统的王权思想分不开.中国王朝的长期统治,没有及时形成集体概念的“现代”国家意识,将整个国家利益看作皇姓一族的“私家”财产,没有真正“大公”的国家主权意识和公民国民意识.除了王朝专制和特权者的利益,在紧要关头,很少顾及整个民族的生存利益.

再说到王国维,在完成这部著作之后,他在『序』中不无自信的说:

“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

在完成『宋元戏曲史』时候,王国维分明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状态,他敢于挑战前人,敢于将一个在文学史上无甚地位的文学形式堂而皇之的做出重新评

19) 鲁迅, 1981, 『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上)』, 『鲁迅全集』第九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70.

20) 鲁迅, 1981,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286.

估,他同时又保持了相当的客观态度.当然『宋元戏曲史』的成就是毫无疑问的,傅斯年称:“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论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亦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²¹⁾

王国维虽然同样涉足非中国文学主流的领域,但对戏曲文学性的重视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个人兴趣.这也是他与鲁迅之间的不同,王国维的文化价值取向多为自我的、封闭的,而鲁迅的则为大众的、外放的.青木正儿曾说王国维“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王国维对戏曲的兴趣主要在于案头文本,对梨园生活和剧场演出并无太大兴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他明说了自己志在戏曲的缘由,起先有感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能代表其年代和文化特征的文学作品,而元代之胜于他者就在于“元曲”,可惜彼时大部分国人未能意识到元曲的独特魅力,戏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向来卑微,“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沈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²²⁾,可见王国维关注的焦点在于“文献”,而并非戏剧性的演出,戏曲的传承在王国维看来更依赖于文本的记载,而不是“唱”或者“演”.所以在实际的戏曲研究过程中,后人可以看到王国维参阅并抄录了大量的藏本及史料,却几乎没有关于王国维去戏园看戏、与时人谈戏、制曲的记载.

在『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评价元曲是在写景、抒情、述事等各方面都能做得很好的“有意境”之作,可称“中国最自然之文学”,『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剧也可于世界悲剧中占一席之地,这些观点与其之前对戏曲的看法略有出入,王国维对戏曲的认同有一个嬗变的过程,主要表现为由剧到剧本的研究视角的转变.

在古代社会,正统思想长期的影响和中国封建农本国家的性质,知识分子的出路十分有限.特别是贫寒之士,要想实现人生的抱负和物质精神生活的富有,只有投效政治体制的“科举之路”.这也是为什么历代封建统治者重视科举和笼络知识分子的用心所在.

进一步比较这两部著作可以发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的评价都是文化价值取向的输出,他以自己的判断为基准,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则

21) 傅斯年,2011,『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新潮』,1919年第一期),转引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3

22) 王国维著,谢维扬等编,2009,『王国维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3.

是以古资料为主,在前人的分析上作进一步的整理,当然这也是王国维做学术的准则,即严谨考究,他以世俗标准为标准,在跨越准则的边缘上试探,虽然作出了想要突破的模样,最终还是选择自我约束.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成熟时期,是士绅为基础的文人官僚社会,同时也是高度集中的王权专制国家.这使中国士大夫文人在个人修养方面,非常重视社会对自己的外在要求,不敢越礼和张扬个性,否则就会被视为异端.由此出现了中国士绅阶层极力维护文化正统的理性禁锢,导致文化要求与现实生活不断分化的现象.吴汉卿、李贽这样有个性和独立思想的作家文人,则被视为那个时候社会的异端或叛逆.南宋的偏安,元而明之后清王朝长期的异族统治,打击了相当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进取功名和积极入世的思想,也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一方面开始接触下层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转向生命自我的主体关照.明清文人画、乾嘉考据学就是一种开辟蹊径的消解生命的文化方式和精神寄托.但是政治的压抑和文化身份的禁锢,使这样的知识分子有着诸多顾忌.唐宋之后,传统文化开始衰败,上层意识形态却更加严厉地规制新的文学艺术的生长发展.所以,历史决定了前后七子的复古很难有大的成就.在古代社会末期,除了宗古载道、阐发微言大义的“桐城派”古文,这种比较节制和理性的形式成为正宗之外,像周作人欣赏的明清小品文只是处于一种私人写作或隐曲的存在形态.小说戏曲的创作,除了自身的生长发展得益于社会经济基础和市民情趣,也成为一些敢于冲破樊篱和不得意知识分子逞笔抒怀的最后出路.在娱乐消遣之外,有些优秀作品不仅揭出大量民间病苦和冤屈,也会更加大胆地批评社会和封建文化及其伦理纲常.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封建统治的最高当局屡屡禁止民间的戏剧演出、禁毁坊间小说淫词的传布.在传统文化和礼教观念深厚的中国,要选择这样的道路还是要面临相当多的困难.

IV. 结语

中国文学主流的交替能够映射出中国社会的变迁改革,没有外来侵略和内部动乱从根本上动摇清王朝的统治,没有晚清时期遭受打击的士大夫阶层广泛的政治文化反思,没有文人学者对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进一步宣传,很难说会

有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也很难预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世纪以后的各种民主革命运动。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新文学，其实与晚清思想和文化历史的一脉相承的东西更多，也可以说白话文运动和启蒙思想直接导源于晚清。

自清末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堪忧，经济政治多重压迫，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不论是新派还是旧派，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挽救中国存亡，旧派中当然有主和退缩的人，但是如王国维这种忠于清王朝，潜心于文学研究的遗老，同样受到新派的重视。

中国不是一个容易被外来文化所能影响的国家和民族，如果不是这种来自外在的力量非常强大，中国人遭受的打击格外沉重，那么中国的传统力量和民族包容性足以消解一切。所以，从认识西方近代社会文明的优势，到真正影响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而观念发生转变，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屈辱过程。后来梁启超、钱穆回顾关照“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发展，可以看出世界发展到近代，中国思想与文化内在本身的变化、整合和分裂。文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引用汪精卫的一段话：“中国之文学革命，自庚子以后，始日以著，其影响所及，当日之人心，为之转移，而中华民国于此形成，此治中国文学史者，所必不容忽也。”²³⁾

这两位在当时旗帜鲜明，但姿态并不热切，综合上文的论证，不难看出，不论是站在新学派一方的鲁迅，还是旧学派的王国维，这两个人都在新旧之间寻求平衡，两个不论从人生经历还是思想都有令人惊奇的相似或相同之处的学者，最后一个走向新生，一个走向自我灭亡。

23) 汪精卫，2002，《南社丛选·序》，于润琦主编：《插图本·百年中国文学史》（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3

● 参考文献 ●

- 鲁迅. 1981. 『鲁迅全集』 (1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鲁迅. 1981. 『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
- 鲁迅. 1981. 『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 鲁迅. 2006. 『热风·不懂的音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傅斯年. 2011. 『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 (『新潮』, 1919年第一期), 转引自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汪精卫. 2002. 『南社丛选·序』, 于润琦主编: 『插图本·百年中国文学史』 (上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 王国维. 1987. 『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 王国维著, 谢维扬等编. 2009. 『王国维全集』第20卷, 浙江教育出版社.
- 王瑶主编. 1996.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陈平原P80~114)』,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殷南. 1927. <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 『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专号』.
- 李宗英、张梦阳编. 1982. 『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 (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周遐寿. 1957. 『鲁迅的故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
- 陈鸿祥. 2004. 『王国维传』, 人民出版社.
- 张允侯、王云开. 1979. 『五四时期的社团』 (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陈独秀. 1916 <吾人最后之觉悟>, 『新青年』, 第一卷第六号.
- 陈独秀. 1916. <我之爱国主义>, 『新青年』, 第二卷第二号.

New and Old School's miniatures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Lu Xun and Wang Guowei

Lu Anqi*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n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from Lu Xun of the new school and Wang Guo Wei of the old school.

The first part describes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China. The replacement of the dynasty shuffles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power politically, the intellectuals are eager to save the country ideologically.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The new and old schools with clear flags take saving the country as their duty. The new school advocates criticized the traditional feudal ethics of China, promoted the spread of modern ideology and culture, and reformed Chinese literature; the old school supported the way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did not want to seek the way of China from the west, and insisted on start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the rise and fall of Lu Xun and Wang Guowei in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including the intersection and opposition between them, the confrontation and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Finally, it summarizes the views and reflections of the Democrats and Conservatives o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hina.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New School(新学派), Lu Xun(鲁迅), Old School(旧学派), Wang Guowei(王国维)

* Ph.D. student, Jeju Nation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접수: 2020. 04. 24 수정: 2020. 05. 13 게재확정: 2020. 05. 15

주저자 육안기는 현재 제주대학교에서 중어중문학과 박사과정을 하고 있다.
관심분야는 중국문학이다.

■ Email: anllalulu0824@gmail.com